

大陸時期的政大

范廷松

(本文插圖刊27、28、29頁)

三個階段一個宗旨

大陸時期的政大，涵蓋「中央黨務學校」(黨校)、「中央政治學校」及「國立政治大學」三個階段。創始於民國十六年五月二十日，迄今已有六十年歷史。筆者於民國三十三年考入政大，到現任亦已四十二年之久，回顧大陸時期的政大，無論是成立背景、教育方針、招生方法、教學制度或訓導方式，都與其他各公私私立大學，大異其趣，值得探討向國人介紹。

政大初創時稱「中央黨務學校」，隸屬於中國國民黨，就國民革命歷程來說，那是「軍政時期」。民國十八年六月改制為「中央政治學校」，那是「訓政時期」的開始。至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中央政治學校與中央幹部學校合併，依大學法之規定改為「國立政治大學」，改隸教育部，那是因為制憲國民大會將正式訂頒憲法，進入「憲政時期」。政大從初建到兩次改制，根據創校人之羅家倫先生在「政校的誕生與成長」文所述三個階段中，都是一個重要的宗旨，訓練青

年幹部充實革命主流。

羅家倫先生說：「當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打下南京以後，全國青年的心理激起了洶湧的狂潮，這股革命的主流雖然屬於中國國民黨，但是共產黨潛伏的力量和滲透的工作，亦蔓延到各地，所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宣佈清黨的時期，認為培養和訓練青年幹部以充實革命的主流，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中央黨務學校的設立，就在這個時期開始。」

黨校籌建時，羅先生是籌備委員兼教務副主任，不久羅先生奉派率領黨校同學百餘人隨軍北伐，擔任戰地政務工作。北平克復以後，羅先生即被派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等到民國十九年他再度回到政校服務時，職務為教務主任兼代教育長。

設校目標崇高理想

當黨校改制為政校時，羅先生說：「有人主張不必用大學名義，以免除受若干法令上的拘束。」於是他「建議在中央政治學校名義之下，設置大學部，為政校的主幹」，他「希望把這個學

校辦成像英國倫敦大學的經濟政治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和巴黎政治學校(L'Eco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相似的標準。倫敦政治學院學術的水準是世界所公認的。而法國政治學校，更在普法戰爭之後，出了許多政治外交上特殊的人才，復興了法國的第三共和國。」這就是政校當年設置大學部的崇高理想。

另一方面，從黨校初創，到改制為政校，再改制為政大，校長一直由先總統蔣介石兼任。蔣公對於政大的教育，非常重視，他於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二日來學校訓話時說：「因為國家對於本校的理想，不是和設立普通大學一樣——普通大學只要能造就幾千幾百學生，在社會上盡到一個普通公民或公務員的責任，就可以達到我們教育的目的；而我們政治學校所擔負的使命，也和軍官學校一樣，軍校學生擔任革命武力的幹部，掃蕩軍事上革命的障礙，我們政校學生就是中國政治革命的幹部，要掃蕩中國政治上一切腐敗黑暗的勢力，要解除帝國主義者所加於我們中國政治經濟上的種種束縛，使我們中國的政治、經濟

、外交、文化、社會，都由我們政治學校師生建立起來，以完成我們中國的革命。」

蔣公又說：「本校教育不僅在教給學生以專門高深的學問，更要使學生有了學問，能够活用。大家現在來求學，也是要以『學以致用』，我們的學問，要能隨時隨地活用出來，才算真正的學問，才能發揮學問的功效。即如軍事學，大家普通總以為是屬於軍事的範圍，殊不知我們辦黨務、政治、經濟，如果能運用軍事學的原理原則和軍事化的精神，就可以發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我們如果有廣博的常識，再有專門專精的學問，就可以隨時隨地，因應制宜，辦事就沒有不成功的道理，尤其是軍事與經濟兩科，乃是政治學的基礎，更是一般革命幹部最基本的學問，大家務必明瞭其基本的原則和常識，往後我們作事才不患沒有辦法。」

從蔣公的訓話中可以看出，政大的教育固在教給學生以專門高深的學問，但更重要的是「學以致用」。他把軍事與經濟兩科，列為政治學的基礎課程，見解尤其卓越。因為蔣公身負軍政重責，日理萬機，無暇親自主持校務，於是在學校中設置一位教育長，處理日常工作，另在教育長之上，設置校務委員會，處理政策性的重大校務。先後在政大擔任過教育長者，有丁惟汾、陳果夫、陳立夫、張道藩、程天放、段錫朋及今總統蔣經國先生。任教務主任者有戴傳賢、羅家倫先生等，至於校務委員，少自數人，多至三十餘人，許多黨國元老、五院院長暨重要部會首長，都曾作過政大校務委員，所以政大教育與中國黨政

關係，向來非常密切。

筆試之前體檢嚴格

大陸時期的一般大學，並無今日臺灣的聯考制度，多係個別招生。政大由於教育體制不同，對國家的任務不同，其招生方法與一般大學也不一樣。

保送制度 政大從創辦之初，其招生即採取直接考試與省市保送並行制度。因為我國幅員遼闊，各省市人民的教育程度相差甚大，尤其是邊遠省分與沿海地區，情形特殊，政大為普遍招訓革命建國人才，除直接考試招生外，並准由各省市政府保送兩名，各省市政府對於這兩位保送名額，甄選非常慎重，大多採取公開考試方式，擇優保送。畢竟因為各省市學生教育水準不同，被保送到校的學生，程度參差不齊，學校常以甄試方式，對於成績不理想者，則令其多讀一年，始准畢業。今日在臺灣就有不少位表現非常傑出的學長，早年在學校曾受過五年教育，我們常開玩笑說他們是「五年制」大學畢業生。

分區考試 分區考試，集中閱卷，是當年政大招生的另一特色，其主要目的，自然是想招收各地區優秀學生，為國育才，以免有遺珠之憾。筆者是民國三十三年夏天考取政大的，當時正值國家對日抗戰最艱苦的階段，東北、華北、華中及東南沿海各省，都已淪陷，政大只就西北與西南自由地區，分重慶、成都、西安、蘭州、貴陽、昆明等六個考區，舉行考試，記得當年考生共有一萬四千多人，經過集中閱卷評分獲得錄取

者，僅有四百三十三人，競爭之激烈，絕不亞於今日臺灣聯考制度。

體檢嚴格

今日在臺灣，學生參加聯考時，先筆試，後體檢，即使是盲啞或小兒癱瘓等殘障青年，仍有升學機會，但大陸時期之政大，特別規定考生在筆試之先，必須體格檢查合格。其中除要求身體各部分健康合乎標準外，尚需儀態端莊，不廝不麻，不能有任何機能殘障，甚至於身高體重都有一定比例。這在今日看來，實在近乎嚴苛，但在當年政大希望教育成功的革命建國幹部，尤其是公務人員、新聞記者，或外交使節，個個都能身體健康，儀表出眾，似亦未可厚非。

第一階段素質甚高

黨校第一期學生三一四人，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已具有大學畢業資格，甚且「在軍事方面，有曾任團長者，在政治方面，有曾任縣長者」（見邱有珍撰：田字房回憶），故素質甚高。他們在黨校接受教育時間甚短，只有十一個月，所以在課程方面，不分科系，主要在使他們認識正確的革命理論，瞭解當時的革命形勢，獲得豐富的社會科學知識，以為適應、判斷及創造之資助。據黨校學長現任立法委員張金鑑先生記憶所及，所開之課程及任課教授為：①黨史及政綱政策，段錫朋。②三民主義及中國近代史，羅家倫。③五權憲法，王世杰。④國際關係，周鯁生。⑤合作運動，余井塘。⑥人口論及帝國主義侵略史，劉英士。⑦科學管理，楊杏佛。⑧社會教育，

趙叔愚。⑨社會主義史，趙蘭坪。⑩比較政府。⑪農業政策，唐啓宇。⑫西洋近代哲學，方東美。⑬政治與經濟地理，韋瀾珊。除正式課程外，每週並延請黨國政要及學者名流到校講演，以砥礪志節。

數學體制逐漸完備

黨校改制為政校之後，其教學體制，大體上是以四年制的大學部為主要骨幹，其次是研究所、專修部、公務員訓練部等。到了民國二十七年夏秋之間，政大由湖南芷江遷至重慶小溫泉、南溫泉和白鶴林一帶，體制才逐漸完備，概述如後：

(一)大學部——大學部在小溫泉畢業的第八、九、十期，分設行政、外交、法律、財政、經濟、教育、新聞等七系。第十一和十二兩期改為法政、外交、經濟三系。十三、十四、十五期再改為法政、經濟、外交、新聞、地政五系。大學部的學制及各系課程和其他大學相差不多。

(二)研究所——好似現在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不對外招研究生，只有研究教授與研究員。

(三)專修部——學制與現在專科學校相似，先後設有新聞事業專修班（分甲乙兩組）、新聞專修科、地政專修科、會計專修科、統計專修科、語文專修科、邊政專修科、人事行政人員訓練班、法官訓練班、邊疆教育行政人員幹部訓練班等。

(四)公務員訓練部——設高等科和普通科。分別以高等考試及格及普通考試及格人員為訓練對象。訓練時間為半年，訓練及格，才發給證書並

分發工作。

(五)學院——先後辦有地政學院、合作學院和新聞學院，和現在大學的研究院相似，但不授學位。

(六)邊疆學校——專為培養邊疆青年建設人才而設，相當於高中至專科的程度，並在包頭、蘭州、西寧、康定、大理等處，設立分校。

訓育制度最具特色

大陸時期的政大訓育制度，最具特色，也最為成功。

同學都是同志 政大在黨校及政校時期，隸屬於中國國民黨，一向被視為三民主義的最高革命學府。黨校時代是國家剷除軍閥革命建國的時期，政校時代是國家反抗抗日寇救亡圖存的時期，那兩個時代的一般熱血青年，早具同仇敵愾之心，以挽救國脈民命為己任，一旦有幸考取政大，不論其原先是否為中國國民黨黨員，自更樂於接受政大革命教育而成為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因此一般社會人士，都深知大陸時期政大畢業同學忠黨愛國之心，特別強烈。

軍事訓練戰鬥生活 目前臺灣大專學校新生教育的軍事訓練，實肇端於政大初創時的軍訓，當年政大的軍訓，遠比目前大專學校的軍事訓練嚴格。記得四十三年以前，即民國三十三年秋天，筆者在政大讀大一時，每天除了穿軍裝、打綁腿，總有幾個小時在操場上持槍作種種術科操練外，還需要「早點名」、「晚點名」，到教室上課要排隊，到飯廳吃飯也要排隊，甚至於還

有一位少校區隊長、中校中隊長，跟我們同寢同食，一起生活，「照顧」與「監督」兼而有之，實在感到吃不消。大二以後，軍事術科訓練沒有了，上課與吃飯不再排隊，但仍有一「早點名」、「晚點名」，「照顧」與「監督」我們的區隊長和中隊長依舊與我們生活在一起。當時不免心生怨懣，不過於四十年以後的今日思之，四十年來，我能有一副健康的體魄，堅強的意志，養成每天作息井然有序，無任何不良嗜好的生活習慣，憑良心說，都是拜當年軍事訓練與軍事生活管理之賜，頓生無限感激之情。

多目標的訓育方式 在校內組織有各種學生團體，從事身心鍛鍊及組織與領導的訓練。負責實際訓育責任的訓育處副主任谷正綱先生及訓育員白瑜、劉子班、康雄飛、聶翰諸先生都是新自莫斯科中山大學留俄返國的革命青年，英姿勃發，精力充沛，對主持會議，維護會場和諧，運用羣衆，組訓民衆等方法與技巧均有研究，就此使學生切實的研習，並運用小組討論、黨員大會、自我批評、相互批評等方式，以激勵革命情緒與進取精神。負責實際教務責任的教務處副主任羅家倫先生，及教授段錫朋先生，都是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富有領導青年，運用羣衆的長才經驗。在這些教師的教導與培育下，學生被薰陶成爲忠貞的革命幹部。

畢業生指導部 是政大特有的組織，這是遵照先總統蔣校長蔣公的指示而設置。蔣公曾說：「今後本校學生，不僅在校的時候要受學校訓練和管理，就是將來出校之後，亦要受學校的指

揮和監督」。

大陸時期的政大各系科學生，以及在政大受過訓的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及格人員、人事行政人員、司法官等，本來就是爲了各方面儲備人才，再加上許多黨國元老與各部會首長，都兼任學校校務委員及教職，畢業生指導部很容易根據畢業同學專長與志趣，透過各種管道，介紹適當工作。至於畢業很久的同學，如有必要，也可以離開現有的工作環境，而由學校另介紹更合適的工作，因此政大的畢業同學之間，聯繫得非常密切，彼此亦非常團結、互助。

見危受命視死如歸

六十年來，政大爲國家培育了無數行政人才，一般說來，大陸時期的政大畢業學生，無論在任何工作崗位上，都能負責盡職，在北伐、抗戰與戡亂期中，獻身革命，爲國捐軀者，不勝枚舉。尤其下列二事，最足證明政大革命教育的成功，發揮了政大同學的革命精神。

民國十六年，政大創校不久，寧漢分裂，共產黨的篡奪陰謀，相繼暴露。武漢政府乃繼南京政府「清共」之後，而有「分共」的措施，因此導致「寧漢合作」之局。不意在合作的進程中，由於西山會議派的「滬方」乘機而出，在「寧」、「漢」、「滬」三方合作的口號下，產生桂系軍人與「滬方」合作的「特別委員會」，汪精衛乘機反蔣。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爲促成團結，毅然宣佈下野，革命形勢頓時陷入低潮。政大師生爲扭轉形勢，曾推派代表至上海挽留校長蔣公

，以格於形勢，未能成功。爲了達成全黨統一，振奮革命，政大師生在段錫朋、谷正綱二先生的領導策動下，於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復成橋畔「一二二」的血花慘案中，同學袁大煦殞命，陳彬和周頌受傷，因此打倒了「特別委員會」，促成第二屆第四次中央全體委員會的召開，決議敦請蔣總司令復職，革命形勢轉危爲安。這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大關鍵，政大師生的奮鬥與犧牲，實有其重大意義與貢獻。

民國三十八年春，共禍猖獗，政大忠貞師生在代校長楊希震教授率領之下，由南京遷杭州轉廣州，至重慶到成都，冒千辛，歷萬苦，追隨政府，待機效命。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局勢危急，師生四百餘人在成都集體請願殺敵，蒙最高當局之嘉許，分別編入中央軍校及戰鬥內閣警衛軍，荷槍實彈，肩負起守土殺敵之重責大任。當時投機分子奴顏屈膝，變節投降，政大師生義憤填胸，抱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之決心，於轉進西昌途中

，在大邑附近與共軍遭遇，衆寡懸殊，陷入重重包圍之中，政大師生堅貞不移，奮勇殺敵，戰至彈盡援絕，死傷枕籍，英勇壯烈犧牲事蹟，誠可與日月爭輝。故行政院長閻錫山將軍曾謂：「政大同學，能於國家危急存亡之秋，慨然赴難，視死如歸，較諸當時臨難苟免之徒，實不可同日而語，此其所以難能可貴也。」前軍校校長張耀明將軍亦云：「政大學生，不但意志堅定，始終不移，毫不爲異端邪說所動搖，而且能够見危受命，視死如歸，以生命行動表現他們的忠勇志節，這不能不說是特識卓行，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正氣。」

政大於民國四十三年七月在臺復校，這是大陸公私立大學在臺復校的第一所大學；教育部部長張其昀博士之所以特別提經行政院准許政大復校，其理由就是因爲政大師生在川西大邑反抗中共暴政之戰中壯烈犧牲的英勇事蹟，可歌可泣，值得表揚。政大復校之後，臺灣教育蓬勃發展，在各方面都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中外文庫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著

定價柒拾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沖、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